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九一期 ——  
(二〇〇六年四月三出版)

---

本期目录 (zk0604a)

---

【峥嵘岁月】	“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反思之一	丁学良
【文献资料】	1976年日记摘录	姚文元
【参考消息】	姚文元回忆：毛泽东想让江青当主席	佚名
【研究报告】	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	陈奎德
【追根溯源】	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	胡星斗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峥嵘岁月】

“文化大革命”就是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的革命  
——文革发动四十周年反思之一

• 丁学良 •

#### ◇ 一位美国老太太的提问

这大约是在1987年的暑假，哈佛大学的几位资深教授（其中包括本书献辞的对象马若德先生 Roderick MacFarquhar 和以研究中华民国史著称的柯伟林先生 William Kirby），应邀赴美国西海岸旧金山地区的哈佛校友会作系列学术演讲。此乃哈佛的传统，在校友集中的北美洲的中心城市，每隔一、两年举行围绕一个大专题的系列报告，以便于哈佛历年毕业的校友们有机会更新知识，了解他们所关心的那些学科里正在从事什么样的开创性研究。这种知识的联系，会引导校友们对母校的捐赠和支持。

那一年哈佛校友会旧金山分会的新任会长是位李姓华裔，旧金山地区又是美国华人的主要聚集地之一，哈佛大学的教授演讲团选取的大主题，因此都是与东亚区域的历史、政治、经济、

社会和文化的变迁相关的。我当时刚刚通过博士资格考试，松了一口气，也被邀请进演讲团。马若德教授要求我以亲身经验为背景，讲一讲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场激进得无与伦比的革命，却导致了共产主义世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资本主义化革命——邓小平的市场导向的改革开放？

每个讲者只有一小时的时间，一半演讲，一半回答听众的问题。我以我的初级阶段的英语，概略的讲了一下我当初为什么成为红卫兵中最狂热激进的一翼的骨干份子，把本校、本县、本地区的走资派统统打倒了还不过瘾，又杀奔外地，先是到省城去参与打倒省委书记、省长的造反行动，后又不辞辛苦，跑到邻省的南京去声援江苏的革命造反派打倒他们省里的头号、二号、三号走资派的壮举。我还讲了我们怎么编印红卫兵战报——我当年最有成就感的革命杰作之一，那便是用十九世纪的老式钢板、铁笔、蜡纸，手刻出小报的“原版”，以手推滚筒的技术，每张蜡纸“原版”油印出一千几百份的红卫兵小报，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组织交流。我还不忘记强调，“文革”是我辈一生的首次、也是一生中最丰富深刻的一次政治训练。怀存由“文革”学来的经验教训，你不但可以在中国政治风暴里潜下浮上、死里求生，而且可以在异乡他国的政治浊流中辩风识潮、进退自保。

我的话音刚落，坐在听众席前部第三、四排右边的一位六十出头的清瘦高挑的白人老太太站立起来，用缓慢有力、一字一顿的语气向我发问：“根据我从书籍、报刊上读到的，从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使数千万的人受迫害、数百万的家庭丧失了亲人、无数的学校和文化遗产被毁坏，人类文明史上很少有几次政治运动，破坏规模能够比得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我又读到听到，所有那些破坏人的尊严和生活、捣毁文化和教育的激烈行动，都是由毛泽东的红卫兵组织当先锋队的。令我不理解和惊讶的是，你作为一个红卫兵参与了那些激进活动，如今已经来到美国，进了我们国家最好的大学读博士学位，竟然至今你不为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感到忏悔。你在谈论你们当年从事的造反运动的时候，甚至有自豪的语气。我真为此感到非常困惑！”

老太太问完，并未立即坐下，立在那儿好几分钟，大概是胸中怒气难消，凝视着我，示意她是在等候我的答复，顿时全场气氛凝重。我虽然被她重炮轰击质问，但她一脸正气，俨然是为不在场的千千万万“文革”的受害者们仗义执言，我不好把她的严词质问当作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于是清清嗓子，礼貌地作了应答，大意是“文革”整体虽然是件大坏事，但“文革”中被批斗冲击、皮肉受苦的人并不全然是无辜的好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无法无天地骑在老百姓头上称王称霸、作威作福，造反派在“文革”中对他们的批斗体罚，很大程度上是受害者的借机复仇泄愤，虽然也不合法，但是有正义性，云云。

我所应答的，确实是我想说明的一个大道理，可是当时就觉得没能把这个道理说透；没说透，是因为没想透。自那以后，每逢与人讨论起关于“文革”的评价，我总是想起那位正义凛然的美国老太太，而我也老是不能忘记，当时她显然对我的振振有词颇感意外（他们大概听惯了西方学界和传媒界对“文革”的标准化的批判），但并没有信服了我的解释。这么多年来，我时不时地在脑子里点击那个问题。我也特别注意到曾经亲身参与“文革”的海外人士中，有两个同我的观点很接近——杨小凯（杨曦光）与刘国凯；这两位关于“文革”的主要评论都列入我开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激进学生运动的比较》课程的学生参考读物中。他们两位都坚持对“文革”中的一些造反行动的原则性肯定（这一点使人易于误认为他们是“极左派”立场），他俩同时又坚持对毛泽东“文革路线”的彻底批判（这一点又使他们与所谓的中国“新左派”、“极左派”泾渭分明）。

事过多年，我倘若再面对那位美国老太太的问题，会这样向她解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各种人报复各种人的乱糟糟的大革命——说它乱糟糟，是因为一个本来就没什么法制的巨

型社会，又让一个自称“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毛皇帝把他平时管治民众的官僚体系从上到下踩得稀巴烂，于是就为形形色色的人相互报复开辟了广阔天地；其中有坏人报复好人，有坏人报复坏人，也有好人报复好人（这四类经典分法的出处下文有交代）。当然这四种类型的报复所占的比例不一样：似乎坏人报复好人的，最终要远超过好人报复坏人的，而其他两类报复的比例更小。所以亲身经历过“文革”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革”，它都不同于一般化了的（generalized）“文革”，不论这“一般化”是由哪一个政治立场（中共官方的也罢，中共官方对立面的也罢）作出的。

#### ◇ “永世不得翻身”

我已经记不清是1967年上半年至1968年上半年的哪一段时间的哪一天，我的母亲——她从来不理解我做的事情，但从来为我担忧不止——悄悄的问我：敬亭山（就是李太白所咏的那架“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的皖南山峦）国营农场的张书记的老婆想来看看我，不晓得我给不给她一个面子，接见她？

母亲老老实实转述的这句话，令我触电般一震之余，感到天下真是变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人下人翻身一跃成了人上人。我这个十几岁的未毕业的初中生，凭借一枝笔（文章和大字报）、一张嘴（演讲和大辩论），成了本地红卫兵的文攻主将，整个一大派造反组织的风云人物。这“粪土当年万户侯”的革命小将凛凛威风，竟也令张书记的老婆低声下气的求见！张书记在县城十多里开外的敬亭山麓下，“文革”以前可是令男女老少闻之丧胆的名字。他领导的那个农场，是这片颇为贫瘠的黄土地上数千农场工人及其家小（其中包括母亲和我）谋生的亦农亦工的国营单位。听说张书记当过解放军里的副营级干部，见过外头的大世面，也识得一些字，对他手下那些多半为文盲半文盲的农场工人和家属，根本就把他们当作农奴加以管教。张书记走夜路时清清喉咙随便咳嗽一声，周围原本汪汪叫的狗们也会吓得四处逃散。

在全农场里唯一不怎么怕张书记的，是位高副场长。高副场长也当过兵，是连级干部，但他在“抗美援朝”的恶战中被美国兵一枪打坏了一只睾丸（即在台湾颇为有名的LP）。他算得上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一旦为什么事极不顺心，就会拎着瓶烧酒，爬上办公室或者自己家的屋顶上（都是比较高的一层茅草大屋），坐在那儿边喝酒边骂人：骂缺德的美国兵哪儿不打，专朝他的命根子打，害得他成了半条汉子；骂某某同事（多半是农场领导班子成员）不尊重他这个老革命，欺负他大字不识一个，给他鸟气受；然后就是向党组织提诉求，要“赔老子一只卵蛋”。那年头的共产党并没有掌握先进的生物工程技术，哪来活生生的“卵蛋”赔他？张书记对他也只好让三分。农场里的任何其他人都缺乏高副场长那样的革命履历，对张书记和他家养的那条大狼狗一样，畏惧之亟。

大约是在1962年的夏初，农场由上级部门分配来一架模仿苏联型式的小麦收割机。巨大的木铁结构的收割机停放在露天的晒粮食的场地上，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现代化大型农机的乡下孩子来说，不亚于是侏罗纪的恐龙再现。孩子们围着收割机又是看又是摸，胆子大的甚至爬上驾驶座，装模作样地扶着方向盘。夕阳西下的初夏的热烘烘的晒场上，孩子们兴奋过了头，竟然没有注意到下班路过的张书记。张书记一见到他视为无价之宝的崭新的收割机旁竟然围满着小孩，小家伙们竟敢对收割机又是抚摸又是攀爬，怒不可遏，大喝一声，扑将过来。他有条腿不太好，平时走路，手里常撑着一根木拐杖，时不时地也可以用来揍职工两下。这当儿那根棍子被充分地利用，孩子们揍得哇哇鼠窜。

这群孩子里数我个子最瘦小，而且我也不喜欢玩动手动脚的物事，全因为我手脚明显的笨拙（往后长大了才知道那是小脑不甚发达的缘故）。别的孩子围着收割机动手动脚，我只是站在

一边看热闹；张书记用棍子挥击孩子的时候，我赶紧躲到远远的大草堆旁，还是看热闹。张书记没去追逐孩子，转身回来察看收割机，大叫一声短缺了什么东西。抬头看见我站在草堆旁，喝令我走过去，问我是谁拧下了那只大镢丝帽子？我摇头说不晓得。张书记不由分说，揪住我的一只耳朵就往他的办公室拖。一边拖，一边斥骂：“你们这帮小杂种，敢碰我的收割机。一只大镢丝帽几十块钱，你们拿小命来抵也抵不了。”他的办公室离那块晒场有一、两华里之遥，中间还隔着一个山坡。我的左耳被他紧紧拧着，跌跌撞撞地跟在后面小跑。开始的时候左耳根的剧痛还令我哼哼叽叽地哭叫几声；渐渐地，耳根麻木了；又渐渐地，左半边脸也都麻木了。被他拖到办公室后，他让我靠墙站着，命令勤务员传话到养兔队去叫我的母亲来训话。

兔子养殖队是国营农场下属的一个小分队，距离农场总部办公室也有几里地，张书记不耐烦干等下去，他拖着我跑了那么远，也累了。于是叫勤务员看管着我，自己先回家去歇气乘凉。等到我母亲从养兔队跑来，我已经在张书记办公室里背靠墙跟坐在地上半睡着了。母亲看着我肿了半边的脸，紫红的成了一条线的眼睛，浑身的灰土和草叶，拖破了的膝盖结着血痕，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张书记的勤务员交待了几句，就让母亲把我先领回去，说扣工资赔镢丝帽的事明天再处理。母亲问我事情的原由，我说我没碰过收割机。母亲把我浑身上下一搜，果然没有什么镢丝帽。看着我肿得像烂南瓜一样的脸面，母亲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牵着我回家了。

那个初夏的夜晚原是很静美的，敬亭山农场坐落的丘陵地带有成片成片的桃树，马上就能收割的麦子散发着暖烘烘的、有点叫人头晕的野香。天空清蓝，月亮跟星星离我们都很近，收工回来的邻边的农场工人家里冒着炊烟，把茅草的薰味播送到近近远远的四处。母亲没有生火做饭，她给我泡了一碗锅巴，自己到屋后的草地上去哭诉。我对此已经习惯了——恐惧地习惯了。自从父亲三年多前病逝以来，每逢遭遇到自己没办法对付的难事，母亲唯一的去处，便是到亡父的坟头上（如果路近的话）或者一片四周无人的荒地上，去跟父亲的亡灵哭诉。母亲相信父亲在地下能听得见她讲述的一切，所以哭诉得实实在在、仔仔细细。末了她一定会埋怨父亲为什么把这样重的一副担子推给了她，让她这么一个一字不识的没用的人活在世上，照看他的唯一的骨肉（指我）？为什么不让她去顶替了又识得几个字又有一份正式工作的父亲去死？老天为什么瞎判人的生死？

第二天母亲开始收拾东西，稍微有点用能带走的，打起包；不能带走的，送给了四邻。几天以后，母亲领着我离开了国营农场，又开始了几近讨饭的生涯。两年多以前，我们母子俩就是从几近讨饭的境地来到这家农场的。在母亲送四邻东西的时候，邻居劝她不要舍了农场出走，这里好歹有一口杂粮糊饱肚子。母亲说她晓得，三年大饥荒刚刚熬过，谁还敢看轻了有口杂粮吃的日子！可是母亲有她的担心，对邻居说了，大家也无言以对：“我孤儿寡母，张书记要你的命，你也只好给他。小歪头（我在乡下时的别名）大大——金宝圩的土话，即‘爸爸’——只有他这个亲骨肉，临死的时候托付了我，做牛做马也要把他带大。呆在农场里张书记把这孩子打成残废，我也没的地方去告状。”

谁也想不到的是——这不是套话，真是任谁也想不到——，不过五、六年的光景，张书记的老婆竟然哀求我接见她！母亲一辈子受人欺负，对所有的落难人都一律同情，要我赶快答应下来。接见是在宣城北门的一间卖豆腐的小店铺里进行的，是在一个阴冷的冬日的上午。人高马大的张书记老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来了她的大女儿和小儿子，让我看在他孩子们的份上，帮她家说句话。“你晓得，”她说，“老张他死了。”她挽起破烂的外衣下摆擦擦眼睛，双眼完全失去了光彩，往日里令农场大人小孩不敢仰视的又冷又辣的光彩。

张书记的死讯我也是得悉不久，据说——我在这翻天覆地的“文革”高潮风头上，忙得根本顾不上去敬亭山农场——他是被农场造反派连连批斗而病死的。造反派们对这位走资派施加

了比对其他的走资派酷烈得多的惩罚：给他戴的高帽子特别高，顶着这么高的帽子游街示众，一不小心掉下来，就会挨耳刮子。有时候给他挂的牌子是用特别厚重的木板做的，钻两个孔，细铁丝穿过去，挂在脖子上，批斗会开两、三个钟头下来，颈子的皮肉都磨破了，渗出血滴。天不冷的季节，还会罚他穿一条单裤跪在尖细石子地上，向所有受过他种种欺压——辱骂、捆绑、关押、毒打——过的农场工人和家属们请罪。张书记刚开始的时候还硬气傲，不主动向他往日视同农奴的下属们下跪请罪，造反派就强按着他的脑壳，一脚横踢他的内膝，便扑通一声倒地。几次下来，他就学乖了，要他怎么跪就怎么跪，要他怎么骂自己就怎么骂。据说他的血压与日俱增，人瘦得像根枯藤，可面容浮肿。那个寒冷的冬天他没能挨过，“翘辫子”了。

“老张他以前迫害革命群众太多，民愤极大，死有余辜，我们全家坚决跟他划清界限。”张书记老婆像背书一样熟练地说着那个年头无数的黑帮、走资派的家属都不得不说的话。“不过，”她的眼泪又淌下来，“他死后的丧事，我们家请求造反派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原来，农场造反派得知张书记死了，不让他的家属立刻入土安葬。据说造反派头头们为此专门开了会，作出革命决定：把张书记家那条咬过许多农场职工和家属的大狼狗给打死，与张书记合理一个土坑，泼上猪血人粪，这叫做“恶狗伴恶人”。

在那一片乡村，按照代代相传的信念，一个人死了若是与猪、狗之类的畜牲同葬，又泼上血粪污物，死者就永远不得转世为人，而会一轮一轮作猪狗，死者的子女后代也永不得好运，像猪崽狗崽一样卑贱，任人宰割。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都呼喊的一句口号：“把某某（走资派的名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敬亭山农场的造反派们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要用这个葬法来具体落实“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的革命造反判决。张书记老婆就是为这事来的，她求我去跟农场造反派头头们说说情，不要让张家的子女后代因为张书记生前的作孽而落到永世不得翻身的境地。张书记老婆说着说着，就要让她的女儿和儿子对我下跪哀求，我母亲立时挡住了，说我一个孩子受人跪拜，会折阳寿的。张书记老婆马上补加一句：小丁（她不敢再以我的乡下别名称呼我）也受过老张的迫害，不过小丁是毛主席的红卫兵，革命小将，心大志大肚量大，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所以来请小丁出面打个招呼，让农场造反派手下留情。

我铁着脸，没表态。张书记老婆说到这里，给我母亲低头深深一弯腰鞠躬，带着两个孩子退了出去。母亲问我出不出面讲句好话？我庄严的告诉母亲：这不是张家跟我们家之间的私事，这是革命造反派和走资派之间的斗争大事。最终，我也没有去和农场的造反派替张家讲情；我不迷信，并不相信张家的子女后代会因为张书记与狗同葬而沦入万世不劫的厄运，不过我认定恶狗伴恶人下土坑的葬法，乃是革命的正义的行动。

#### ◇ “五湖四海战斗队”

在皖南宣城、郎溪、广德的丘陵和山区一带，有多个劳改和劳教农场，那些多半是1950年代末尾建起来的，主要是收容和关押从沿海地区及本省各地押送来的犯过小罪、判了轻刑的所谓“坏分子”。犯过大罪、判了重刑的，就不会关在我们那儿，而是送到青海、甘肃、新疆去了。

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开始冲击到了“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劳改和劳教农场都是它们管辖的，也随之乱了套。管教干部多半成了被批斗对象，被管教的劳改和劳教人员就趁机逃离囚羁之地，跑到自由社会上来。他们中的一部分胆大之徒甚至成立了造反组织，通常起名叫“五湖四海战斗队”——这队名乃是对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的产物，毛的小册子《为人民服务》里有段名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逃离囚笼的劳改和劳教分子自称为“五湖四海”，是双重意义上的诚实：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从各地被抓被押运来的；他们从今以后流窜五湖四海，哪儿能混日子，就到

哪儿去。他们把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学得也挺地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让你逮他不着。想来这也自然，千百年来的绿林强人，包括水浒梁山好汉和毛泽东当年率领的游击队，都是靠这方法谋生存的。

五湖四海战斗队中的一部分，原本就是因为小偷小摸、拐骗欺诈、调戏妇女、破坏公共财物而被抓被关的；在关押期间，少不了承受管教干警的打骂，于是把历年所有积压的愤恨，都及时地在五湖四海战斗队的大旗下发泄出来，报复正常的人们。他们当然不敢去攻击有武装有组织的军队和造反派团体，也不敢到城市来捣乱，就专捡偏远的乡村去骚扰农民，抢劫财物、屠杀牛猪、调戏民女、乃至纵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子，都干得出来。被多次骚扰的偏僻乡村，有些就沿用中国历史上兵荒马乱年头的办法，自组民团保卫家园。每个村庄都设立了了望哨，一发现有五湖四海战斗队流窜而来，就吹号鸣锣，周边邻近村庄的民团便赶来接应。双方的武器，多半也就是长矛大刀、鸟枪土炮。偶尔有被民团活捉的五湖四海战斗队队员，他们就捆绑来送到城里的驻军部队。在三县两省互不管的地带，民团活捉到五湖四海战斗队的，往往就动用私刑来报复他们。我们听到的最骇人的一件，是宣城和邻县交界处的山区里，民团把在当地屠杀耕牛、洗劫孤立小村子的五湖四海队员抓获，就将他们“栽”进麦地里，只露出肩膀以上在地面，然后把耕牛套上犁，鞭抽牛耕耘而过，几个来回，露出地面上的几颗脑袋就被犁得干干净净。用这个办法报复五湖四海战斗队，是为日后万一上面有官追究责任，好脱干系，村民中无人可被明确认定为“动手杀了人”。

1968年夏末秋初的一天下午，我们正在本派武斗大本营区域的一个小院落里休息——白天休息，是为着夜间准备打仗——，突然院门外哨兵通报有贫下中农代表来求见。进来的五、六个农民诉苦，说他们那一带久经五湖四海战斗队的侵扰，好不容易把民兵组织起来跟他们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人，绑交当地人民解放军，部队却拒收。拒收的理由也说得过去：部队没有监狱，把俘虏关在哪里？部队一接到命令就得开发，带着个五湖四海分子又怎么办？贫下中农代表说：这年头他们最相信的人就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解放军，和毛主席的红小将。既然解放军不接收，只好请红卫兵小将们处理俘虏了，你们最懂毛主席的路线政策！

贫下中农代表把捆成一团的俘虏往地下一丢，就告辞走了。当时在院子里负责那一支武卫小队的，是白大舌头。他出身农家，忠厚耿直，疾恶如仇，听说俘虏是一个为害乡下农民的小土匪，就喝令立刻升堂审讯。审讯犯人得要有法律上的依据，红卫兵小将们虽然狂妄透顶，也多少晓得这个道理。白大舌头的武卫小队商量了一下，拿不出个主意，也让我们文攻小队的成员过去参与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最高指示”就是法，毛主席最高最新指示里哪几条能对得上号，马上就运用起来。红司令没让他的红小将们失望：《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里能在这场合用上的，有好几条，比如，“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法庭”——这是红小将对他们临时组成的审判机构的命名——由白大舌头担任审判长，他挑选了他信得过的几个人作助手，基本上全是武卫队的队员。俘虏像一个大湿泥团，歪歪斜斜的半躺在地上。审判开始的时候，我不得不赶到本派总部所在地县面粉厂大楼去，负责明天清早就要印出来的《战报》上“血淋淋的战斗檄文”——那是我的本职，每天夜里都要红着眼睛干到两、三点钟的革命事业。第二天中午吃过饭回到那间小院子去睡大觉的时候，一进门就发现与平时不大一样，气氛压抑，遇到的人都不怎么说话。一问，吓我一跳：出人命了！

昨天傍晚的审讯进行了两个来小时，俘虏供认了很多：他原来是劳改农场刑期未了的“坏

分子”；在五湖四海战斗队里担任小喽罗；曾经参与过多起抢劫农民财物牲口的行动；那一次放火烧村民房屋是不得已，因为人少打不过贫下中农自组的防卫大队，情急之下爬到一家茅草屋顶上，掏出火柴吆喝威胁：“你们再不退到远远的我看不见的地方，我就点火烧屋了！一盒火柴二分钱，烧你几十间！”农民自卫队没后撤——他们哪个敢撤？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都在村子里呐！

俘虏说，他见不动点真的吓不走农民，就划着了一根火柴，朝茅草屋顶凑去，边凑边吆喝：“我真要烧啦！”谁知夏末秋初的天气，茅草屋顶让烈日烤得脆干，那根火柴还没有碰上屋顶，就“腾”地燃烧起来。俘虏说，他吓得一滚身摔下屋顶，躺倒在地爬不起来，被生擒活捉；十几间茅草屋立时就烧塌了。俘虏的供词划了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法庭”再一次请示了“最高指示”，毛主席《对镇反工作的批示（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九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七日）》早就教导说：“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所谓打得稳，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杀错。打得狠，就是要坚决地杀掉一切应杀掉的反动分子”。纵火烧掉那么多贫下中农房屋的监狱逃犯，当然属于“一切应杀掉的反动分子”之列。于是自封的“法庭”审判长审判员们一致投票，判处被俘的五湖四海队员死刑。

死刑宣判了，可是执行却成了问题：红卫兵小将们敢于判决——那是抽象的杀人，却不太敢去执行——那是具体的杀人。日后上面追查起来谁出头露面去负这个责任呢？这个关键时刻我们红卫兵武卫队的总头目“大肚子”回来了，问清了前后缘由，把白大舌头一伙人痛骂了一顿：“你们这帮蠢货，为什么揽这种事？解放军都不接收，你们充什么大头？你们以为农二哥（注：那年头叫工人老大哥，农民老二哥）自卫队都是老土？他们就是不愿把这种杀人的麻烦事做到底，才把这个烂西瓜捧到你们手里的！”

白大舌头他们被骂开了窍，发现这个烂西瓜真正是不好收拾了：你不能把他给放了，放出去他再抢劫纵火甚至加倍报复村民怎么办？你也不能把他给毙了，你毕竟不是国家正式的法庭和行刑队，枪毙犯人与武斗中互相开枪乱打是不一样的。你把他往哪儿送呢？“公检法”机关已经被打倒了，那里早就没人上班了。想不出个好办法，他们只好把俘虏捆绑在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树上，怕他半夜里跑掉，手脚都给粗绳子打了死结。

开始的时候，俘虏还哼哼唧唧的，叫“痛啊，痛啊”。红小将们喂了他几口水，又灌了他一点稀饭，就把他搁在那儿了。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红小将们醒来，发现那俘虏不吭不唧的、软软的靠在树上，很庆幸他半夜里没有逃掉。过了一阵子见他还是没动静，也不要水要饭，就纳闷的过去察看。凑近一看，人已经没气了。

“死人啦！他死啦！”所有的人都被这叫喊惊动到院子里，望着那具死尸，束手无策。请示过本派大本营之后，红小将们还是去把当地驻军的代表缠过来，把前前后后的缘由说了一遍，作了笔录，然后把那具死尸埋葬了。部队来的一位军医（他临时充当了法医）说，那五湖四海队员早就让农民自卫队给打得半死了才送过来的，而且好像是包在厚麻袋或者破棉被里狠打的，所以不怎么露外伤。农二哥们很精明，把这个麻烦轻易地抛给了革命小将。

一年多一点以后，武斗息止了的宣城，置于全面的军事管制之下，白大舌头被军事管制委员会下令逮捕，罪名是非法设立法庭、打死一名游民。白大舌头被关押了将近一年，期间他的可怜的父母家人为他四处奔波，找证人写证词，证明那名游民其实是非法逃离劳改农场的犯人，证明他逃出来后还累累为害乡民，证明那逃犯其实不是白大舌头动手打死的，证明当时解放军的两名干部还到场观看了五湖四海队员事件的处理。近一年之后，大约是在1970年的年尾，白大舌头被释放。是无罪释放？不是。是带罪释放？也不是。在既非“有罪”也非“无罪”的含含糊糊的背景下，白大舌头日后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卖力气的活，养家糊口。

在白大舌头被捕、坐牢的关头，足智多谋、同时也是主要见证人之一的大肚子也帮不上忙，因为大肚子自己也落了难。他三次被莫名其妙地抓捕，三次被莫名其妙地释放（邪门的是，他每次被捕，我都在场）。在看守所里，他经受了多种多样无产阶级专政的折磨，包括大热天正午烈日下，头顶一盆水跪在水泥地上“反省”，水盘翻倒了就再加一个钟点；把他的一只手同另一个犯人的手锁在一起，让他们吃、睡、拉、撒都难伺候自己；二十四小时对他的“号子”（即小间牢房）播放高音喇叭，或者二十四小时在他的号子里亮着五百瓦的大灯泡，让他发发神经病。

大肚子反反复复被抓被放，也是宣城的专政部门存心跟他玩“猫捉老鼠”的把戏：明明搜集不到他该坐大牢的证据——他虽然是我们红卫兵的武卫队大头目，不过并没有亲手打死打残过人，也就是没有血债、没有债主——但却恨透了他，要让他尝尝“没有终结的恐怖比恐怖的终结更恐怖”的滋味。此乃是因为“公检法”系统在1966年夏至1967年冬期间，是属于对方保皇派阵营的，经常被我们这一派冲击，几个主要的干部也被我们戴高帽、挂牌子、游街和批斗过。用他们日后私下里的话说，“我们专政系统的人，从来没有给人当猴子玩过，你玩我，能让你白玩？等到老子收拾你的那天，就要你大开眼界了。”

说白了，还是报复：被毛泽东“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号召鼓动了的造反派造过反的“专政机器”，同样凭着毛泽东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的号召，报复那些造了他们的反的造反派头头。1969年下半年宣城处于军事管制之下，老“公检法”系统的干部就专司临时看守所——一处位于宣城北门长街中段的大院落，四周高高的、忧郁的灰砖墙，那里成了我们众多红卫兵头头和骨干分子的“学习班高级阶段”。“学习班”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简称，是毛式政治智慧的精妙体现——不循任何法律程序把人抓起来、关起来，进行期限不确定的心理的、肉体的多维度惩罚，而又不冠以“监狱”的恶名。

“学习班初级阶段”的所在地便是我们宣城中学第二教学大楼的楼下大教室，可以容纳二三十张上下铺双人床，我们这一派红卫兵的头头和骨干分子四十多人都住、吃、“学习”在里面。“学习”的内容就是每日每时没完没了的检查交待：在过去的两年武斗期间，有没有打砸抢抄抓、冲击军事禁地、抢夺枪支弹药、劫取国家机密、组织大规模武斗、杀人放火放毒？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所有这些都是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们——特别是林彪和江青——前两年号召我们干的，现在又反过来对我们秋后算帐。

每天清早我们就得起床、点名、排队、上操，然后就是一整上午、一整下午外加夜晚几个小时的“学习”。每隔两三天，通常是上午十点来钟或者下午三点来钟、正值我们学习班成员精力充沛之际，就会有军事管制小组和看守所的军警人员来到我们学习班门口，学习班的班长——实为监管我们的人——一声紧急集合口令，学习班成员们必须放下手头的所有东西，跑步出教室来到楼前的小操场上排列成队。这时刻从看守所来的原“公检法”干部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大声地、缓慢地念道：“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的最高指示，经过县无产阶级专政部门的查证，报县军事管制领导小组的批准，特此宣布对坏头头（或打砸抢抄抓骨干分子）某某某实行隔离审查。”此时立刻就会有如狼似虎的三、四个“公检法”人员抢进我们的行列，抓住被点名的那个人的头发，反扣他的双手在背后，推搡出行列。扭转他的身子，面朝向我们，来的警员拎起手中的红白相间的一公尺多长的大棒，一个横扫将他击跪在地，带上手铐。与此同时学习班班长带头呼喊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震天的口号声中，人被跌跌撞撞的带走。

所有这套程式，对我们红卫兵小将实在是太熟悉了，熟悉到黑色幽默的极至高度。在过去的两年多里，我们每天每日就是用这样的程式对走资派们（包括那些“公检法”系统的头头脑脑）作革命专政的——当时称之为“刮十二级红色台风”，或“红色恐怖”；现在对我们这帮红



色恐怖的先锋部队实施同样颜色的恐怖，一点不改，一丝不苟，真是妙极了！我们学习班开办之初，有四十余人；就这么每隔两、三天被提走一人，谁也不知道人被提走的详细缘由，谁也不知道提走以后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谁将是下一个被提走的。——没有终结的恐怖，远胜过恐怖的终结，法国大革命阴影下的雨果之言，不虚矣！

一个半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到末尾，我们“学员”里面少了十几个人，剩下的每个人少了十几斤肉。我们那一帮人对中国政治、对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对文化大革命的实质之悟察洞悉，在“学习班”期间有了突飞猛进。

#### ◇ 还是江青说的到位

真正把文化大革命发动者的深层动机和这场革命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一语点破了的，还是江青。她在“文革”一开始，就着手系列地迫害那些1930年代在上海演艺界比她有名、有钱、有地位、让她吃过肉体或精神亏的男士女士们。演艺界里她最想干掉的人之一，是孙维世；孙是周恩来的干女儿，中共那一代里有名的美女和才女。她非但了解江青1930年代的底细，瞧不起江，而且据说1946年孙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后，便被毛泽东看中且染指，是江青的多重意义上的敌人。1967年秋天武斗高峰上，江青对林彪的夫人叶群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

孙维世于是被叶群动用空军部队秘密抓捕关押，一年后不明不白的惨死狱中。1966年7月28日，江青在北京的一场大会上评说：“我们不提倡打人，但打人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嘛！”“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是误会。不打不相识。”林彪对此进一步展开：“坏人斗坏人，这是‘以毒攻毒’”。

这两位对“文革”中各色人等相互打斗报复的精彩评说，大概都是摸透了毛泽东的心路思路。1966年北京和全国的“红八月恐怖”的广泛打人状况传到毛那儿后，毛的议论便是：“党的政策不主张打人。但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当时官方文件称江青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称林彪为“毛主席最好的学生”，真不是拍马屁；他们两位对毛发动“文革”的心机和动机，确实理解得格外准确。

#### ◇ 革命就是报复

我终于达到“革命就是报复”的普适性的理智认识，要归功于一条后来查无实据的新闻报道。1989年六四惨案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里边，各种各样的谣传飞满天下。某一日我从美国的一家英文媒体上读到，四川、重庆赴北京游行示威的大学生们被从天安门广场清场赶出京城后，悲愤于他们的同学和平情愿却挨杀被捕，立志要报仇雪恨，于是星夜赶回四川，欲去邓小平的故乡广安挖掘邓家的祖坟，这么干的理由是：“你老邓下令杀大学生，让别人家断子绝孙，我们也要刨你的祖坟，让邓家断子绝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这条报道写得有声有色，令人读来始而血脉贲张，继之毛骨悚然——到了二十世纪的末尾，中国统治集团中最具世界视野和大历史感的改革总管邓某人，与中国社会里思想最激进、最渴望政治自由的大学生，在血仇报复这一点上，却是那么的心心相印！

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密切关注着英文中文媒体对这条消息的追踪报道；奇怪的是，犹如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了音讯。我揣摩，那篇英文报道当是洋人记者基于在中国的现场采访参加学潮的大学生而写成，因为那种刨祖坟报仇雪恨的观念是典型的、地道的中华传统的，非洋人所有。发了那种豪言壮语的大学生，可能说时有意，到了行动的时候或许就没了胆；或者

有胆量也没机会——邓家祖坟乃是龙脉所在，岂是不设防任你外人可进可出可动土可移石的？

把所有这些可能性考虑进去，仍然改变不了那篇报道所透露出的历史深层讯息——革命就是报复。文化大革命中千千万万普通的中国老百姓乃至社会底层的贱民们，利用了红色始皇帝毛泽东“对走资派造反有理”的圣旨，报复了自1949年10月以来一直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红色官僚特权阶层（此前，任何这类犯上的言论和行动，都会遭到及时的镇压）。邓小平作为这个阶层的最高首领之一，不但自己丢职丧权、受了诸般凌辱，他的基本上无辜的大儿子也被折磨成终身残疾。1989年5月底至6月初，邓小平报复了胆敢再一次要扫除官僚阶层的制度性特权的大学生——在他们的口号和行动上，邓看到了二十多年前把他打倒了的那帮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幽灵再现。

◇ 旁观者清

1989年底至1990年初的那个冬天，我在哈佛文理研究院宿舍的原来同楼层的好友Blanford Parker——他是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公认的过去十几年里最优秀的研究生——忽生奇想，要与我合作一本英文书，叙述我自幼年起一直到进入美国为止的经历。我们在饭后饮茶（他滴酒不沾，但每日饮胡椒味可口可乐的消耗量是我饮啤酒量的三到四倍），谈论我的经历跟他这样同年龄美国人的经历之差异时，他每每感叹：在他们听来，我1980年代以前在中国的生活境况，是属于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的那些时代才可能有的事情。所以他觉得众多的美国读者一定会对这本传记感兴趣的。我们把书名都初拟好了，叫作My Grandparents Had No Names（《我的爷爷奶奶没名字》）——我告诉过他，我的祖父祖母是偏僻之极的乡村里贫贱之极的农民，活了一辈子只有姓，没有名。

每星期有两个下午，我俩在火炉旁坐下来，准备那本传记。我口述，录音机转动，他随时提问，发掘细节，理顺故事的脉络，一共录音了将近四十盘磁带（每盘六十分钟）。他主张：我们的书就从1989年六四事件后四川籍大学生誓言要去邓小平老家挖掘祖坟的报道起头，因为——他解释说——，这个情节最具有古典希腊史诗和悲剧的意涵及韵味：它用“复仇”这一人类最本能、也最强烈的动机，把文化大革命同“文革”以前中国的政治社会不公，与“文革”以后的中国政治阴谋和搏斗，天衣无缝地贯通一体。

还是旁观者清。他对中国当代政治斗争在“革命”的大纛之下演绎出的一幕又一幕，比许多的中国问题评论员——黄皮肤的或者白皮肤的——，看得都要明白。

收入丁学良 《液体的回忆》（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增订版 新章节

□ 原载《观察》网站

~~~~~

【文献资料】

1976年日记摘录

• 姚文元 •

2月11日

天安门有反革命传单曰：打倒张、姚，还有什么“打倒少壮派”。“少壮派”一类是国民党、苏修的惯用语，为人民的敌人所仇恨，“打倒”，不胜光荣之至。这本日记没有多少可看的東西，

无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相互“打倒”而已。但革命讲政策。说厉害，是远远不及反革命派的辣手的。我手无寸铁，就一支笔，且是铅笔。“打倒”除杀头坐牢之外，就是把我这支笔剥夺得掉。

2月13日

晚，因金英、郭文动员去京西看上海同志——天水、秀珍、景贤。黄涛在，金祖敏也在。毛远新、魏秉奎等二位辽宁同志也在。畅谈了反击右倾翻案的重要性、艰巨性。后冶金部陈绍昆来，考了他一通，要他同邓小平划清界限。他揭发了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问题。阻力很大，国务院基本没动。

2月16日

从二月六日人民日报文章（注：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喜看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破浪前进》）发表，到明天批判不肯改悔走资派的“三项指示为纲”，批邓是深入一步，群众也发动起来了。外国人称说，宣传工具是在左派手中。但“搞经济工作的是求实派”。经济工作什么时候能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领导呢？

2月18日

现在运动步伐加快了。人极累，看到群众运动如火如荼，“人间万窍号呼”，直指走资派，心中是高兴的。

2月19日

十七日报导（注：《要害是复辟资本主义——北京师大师生员工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发表后，形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资产阶级是多么渴望把新闻武器从无产阶级手中夺去啊！这一武器是多么有力！

3月7日

四川出现贴张春桥的大字报，阶级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3月30日

南京冒出一批针对上海的大字报，还有“揪出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反对抢班夺权”一类标语，据说弄了一批学生（大多是高干子弟）上街。这是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

每次运动发展到一定时候，反动势力都要跳出来“示威”一番。也好，让革命群众多看看。只是中央政治局太迟钝了。又快到“四一二”了，又要“炮打”了。

主流是好的，革命群众精神振奋地在批邓中前进。“同右倾翻案风对着干，敢挑千斤重担夺高产。”这是工人阶级的声音。朝农批资产阶级法权达到相当深度。清明节将要到，发现南京、北京、太原都有借此搞“悼念”总理的活动而闹事的苗头。

4月1日

南京“大字报”已点了张春桥的名，是“打倒”、“揪出”、“野心家”、“阴谋家”，……还是林彪在庐山会议上那一套。昨晚政治局开六人“紧急会议”，我坚持起草一严肃的通知。今日主席即批准此通知，发江苏并发全国。估计这几条下去，会对这股猖狂反扑的妖风起当头一棒的作用，而使人民更加认识邓小平的反动性。但斗争不会就此止歇。有一个地下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活动，这一点更清楚了。

4月3日

继江苏、浙江等地后，反动标语开始在北京出现。昨天天安门人群激增，用所谓“悼念”总理发泄对运动的不满，发表反革命演说和反革命口号，有的还公开反共，这是没落垂死势力的挣扎和疯狂反扑的一种表现。他们是否已用完了它的后备力量，我看还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科学院、七机部）是它的基础。……而这一切说明：如果党内走资派得势（势），不仅是丧失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民主革命成果也会丧失。反共的还乡团会一起扑上来残杀、镇压劳动人民。还有一个搞匈牙利、林彪式政变的反革命口号是：“我们要民主！不要法西斯！我们要周总理，不要佛朗哥，更不要那拉氏。”还有的人煽动成立群众组织，“要坚强，要防止一个个被击破”。这也是林彪一伙的反革命口号……中国这个国家，激烈的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某一个方面、部分）却总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批反革命分子呢？专政究竟不是绣花。

4月4日

今日高潮仍是国家机关、七机部、科学院等居多。有的花圈奇形怪状，挂在吊灯上。海燕在汹涌的波涛上迎风飞翔，共产主义战士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反革命活动会锻炼出一批革命派，这也是历史的辩证法——太顺利了不好。晚政治局开会，我接到人民日报记者电话，告广场上有人进行反革命演说，直接点了江青的名，内容极坏，无人制止。我立即向政治局报告，激起了多数同志的愤慨和警觉，决定立即逮捕这两个反革命，清除花圈，派民兵、部队戒严、封锁进路，明天一律不准再送花圈。吴德和倪志福同志紧张地走了。不久，即听到这个坏蛋被捉住的消息。无产阶级专政总得有一点“专”的样子呵！太软了！北京市还是努力做工作的。只是谣言一时难以全部肃清。问题还在部队中？前两个月批邓中我曾说：如果下次再来比这次更厉害时，人们都当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但果然如此！从全国看，太原、西安、沈阳均有发现。凡不批邓的，都在保周的口号下集合起来了。这是一次阶级阵线的鲜明划分。

4月5日

今天经历了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我目睹了反革命暴徒在天安门广场的表演，并自始至终参加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下午二时，政治局紧急开会，人民（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赤裸裸的反革命煽动，反革命暴动事件，打了解放军烧了汽车，打了民警，打了革命群众，并且冲到人民大会堂东门。

一批人在纪念碑进行反革命煽动，号召成立反革命组织，以“悼念”总理为名，猖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中央，提出要邓小平上台，喊“总理万岁！”

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

其中提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一小撮野心家”搞的，邓小平主持工作是他们“决定性胜利”。听了这个情况，我提出此事已带有反革命政变性质，要立即采取措施，开短会，不要多议。当即决定：由吴德发表讲话，指出这是反革命性质事件，号召群众离开广场，然后立即组织民兵进行包围、分割后拘留其骨干分子，予以有力打击。

三时散会，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厅外，看见了广场全景，四大批人拥来拥去，两堆火还在历史博物馆外燃烧。我即请政治局同志都上来看一看，在江西厅，大家都来了。这是触目惊心的反革命事件，一场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前奏。碑前核心部分有一批坏蛋始终不动，谁去反对就打谁，另有一伙人进行反革命演说，送花圈、贴传单。外面有好几万人，流来流去。再外面有一批骑脚踏车的人飞快地来回巡逻，看来是通风报信的。还有不少小汽车，有不少是部队的。不一会，解放军营房的小楼着火了，又一辆车着火了，火光熊熊，黑烟冲天。于是，看见楼上把被子、床单、衣服、书箱、纸张一批一批地从窗口掷了出来，掷到火中去烧。救火车无法接近。

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大喇叭还不响，我们很急，一再查问。华国锋要求王洪文、张春桥、我留下来处理。我同意。终于，在六时二十五分，人民广场的大喇叭一响，立即看见广场上的大多数人潮水一样一批又一批向外退去，不到一小时，广场上人已大为减少，看热闹的走了，核心部分就越来越暴露在面前。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

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下迅速被击溃。带着棍子的民兵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广场，从南北两方面加以包围，敌人彻底瓦解了。

晚，政治局开会听汇报。战果辉煌。

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

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4月6日

晚，政治局开会，毛主席听了民兵拿起武器非常高兴，说：“士气大振，好！好！好！”决定搞一文件，北京市委员会起草，通报全国。昨日紧急起草的一篇社论，今日已见报，毛主席批了。指出了对反革命政治谣言要严加追查，对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4月7日

清晨刚吃安眠药不久，又来电话把我叫去开会。主席有重要指示。主席问了天安门的情况，当毛远新汇报到政治局准备发一内部通报时，毛主席说：“要公开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不是发北京市革委会的报导，而是发人民日报记者的现场报导一、二、三和吴德同志讲话。并据此开除邓小平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批准。1、首都；2、天安门；3、烧、打、砸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据此赶出去！同时决定，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以上四件均登报。这是在关键时刻，以果断行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一举粉碎了反革命事件的首脑。将动员起千百万人民起来进行斗争，表现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和决心。决不犯巴黎公社放松镇压反革命的错误。我热烈拥护主席的决定。会上决定，今晚八时广播。我提出还有份刚发出的情况，是反革命分子在民兵强大威力下被缴械的报道，应补入。由于人民日报是内部报道，把几份合成一份，时间极紧急，我立即把人民日报社的鲁瑛、新华社的解力夫、广播

局的邓岗、肖木四人找来；并组织了汽车，规定这些人一律不回去，成立指挥小组，每个单位准备了通讯联络工具，有事商量应由各单位负责人立即通过汽车送回。人民日报几个记者也来了。非常高兴，几夜没有睡了，眼睛都充满了血丝，但立即投入了写稿的战斗。不久，毛远新向毛主席汇报回来了。主席还说：决定中要加上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晚八时广播，还要译成外文。当讲到人民日报还有一篇时，主席说：对呵！正在看。同意要跟省、市、大军区同志打招呼。稿子改、排、校、送，花了不少时间。终于在政治局修改通过了。报主席。在两个决议、一个讲话批回来以后，此件也批回来了。当时是六时四十分，离广播只有一个小时多了，还要先期录音，由于预先已准备好车子，广播局同志立即带了稿子离开。我说要坚决保证及时、准确地完成任务。七时开了一个北京各负责人会，只有十分钟，读了两个决议，要大家听广播。开完会，其他同志都走了，我决定留下来，听了广播再走。因为历次经验告诉我：这样匆忙地赶出来的东西必然在文字上会有误的，需及时校正。因而宣传单位的几个人也留了下来。一天身体已很疲乏了，但精神是十分振奋的。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后，八时来临。收音机响了！播音员宏亮的声音，十分有力地播出了四个文件，声音在大厅中如洪钟般震荡着。果然发现有个别错误，如“天安门”误写为“人民广场”等，立即进行校正。请同志们吃了饭，在这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后，我们这个宣传的前线指挥部任做了。

各自回本单位，艰巨的、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大家。我怀着一种战斗的喜悦回到家，同时又抱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回到家时，英、三三、莉莉一起极为高兴地拥上来，都说：“好得很！”“大快人心！”我很想多说几句，但这时又感到一种特别的疲劳，坐在沙发上不想多说了，一天只吃了一餐，走了许多路，精神上的紧张……这时随着一个大战役的结束而迸发出来了。英劝我躺一会，我躺了一下吃了安眠药，但始终睡不着，又爬了起来。是的，不能骄傲，不能麻痹。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路还很长，还有许多政治、组织问题要处理。但是今天这一切，都以鲜明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是有力的面向国内的亿万劳动人民和全世界的宣传，把反革命的阴谋煽动彻底揭穿；二是武装起群众，坚决拿起棍子（必要时机）；三是果断的组织措施。千百万人民懂得了阶级斗争的真象（相）和自己的任务，敢于善于拿起武器同反革命分子战斗，用铁拳狠狠打击反革命分子，同时中央机构及时地处理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叛徒，从无产阶级利益出发，打破一切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束缚，（如要开全会“选举”啊，要开“人大”通过啊……）采取果断的清除坏人的组织措施，这是粉碎反革命政变的三项基本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胜利前进！毛主席万岁！

四期简报，均是我修改后发的，留此以作历史的纪念。

（注：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特刊第二六五期钉在日记中）

4月8日

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者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问题还在党内。这次事件，我看有三种因素作用：（1）党内走资派（包括要保卫资产阶级法权的高干子弟）；（2）社会的渣滓，从刑事犯到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到反动文人；（3）还有特务（国民党，苏修）。其中党内走资派是台柱，主心骨，凝结点。故征途尚长。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首，总括以记之，以待下次斗争参考对比。

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

巍巍雄碑立，堂堂大道通。万千烈士鲜血，化作广场宏。忽见群魔乱舞，阴火呼风四起，恶鬼逞狂凶。工兵齐奋起，铁拳镇爬虫。

霹雳震，怒激涌，扫黑风。誓除阴暗丑类，旌旗耀碧空。万里征程尚远，白发红颜携手，文武追敌踪。回首火烧处，红楼倍鲜红。

9月13日

上午同国锋、洪文守灵；接待朝（鲜）、阿（阿尔巴尼亚），罗（罗马尼亚）等国使节，许多外宾在主席遗体前失声痛哭，表现了各国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不知为什么，江青没有参加会见。后来她提出政治局开会，在会上。因为遗体问题和华吵起来。她的言词很激烈，大家都不满意，这样下去很危险。主席不在了，有些人已开始疏远她。我不能这样做，要尽力帮助她，支持她，要对得起主席。下午审新华社稿和电视台的录像，没有江青的镜头，已让邓岗补上。人民日报社论又改了一稿，已送春桥同志。他心情很不好，人也瘦了许多，似乎有什么话要对我讲，过几日应找他谈一谈。晚上，同英长谈，重点国内形势和党内斗争。她的政治嗅觉很敏锐，和我有同样的预感。主席逝世，一些人可能会趁机闹事，要提高警惕，要有所准备。我和英最担心的是孩子，他们尚小，不谙世事，能经受得住残酷斗争的考验吗？孩子，又是孩子，我近来为什么老想到孩子，为什么变得这样多愁善感，这是意志消沉和怯弱的表现。我要振作起来，要充满信心，为了孩子，也要勇敢地投入战斗。

记住马克思的一句名言：“我最喜欢的生活——战斗！”

~~~~~

#### 【参考消息】

姚文元回忆：毛泽东想让江青当主席

· 佚名 ·

◇ 姚文元新撰《回顾与反思》爆历史真相。

姚文元在回忆录被禁后，去年冬天又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就本人亲身经历，所参与、所见的历史事实，能以回顾、叙事的形式写下来。他的这一要求获准，还为他配备了一名资料助理员。

姚文元用了近八个月的时间，写了五万多字的《回顾与反思》，并澄清了若干重要历史事件的真伪。其中爆出了若干历史真相，实际上这是他回忆录的简本。

以下是该《回顾与反思》的部分内容。

◇ 毛泽东对林彪外逃事件的反应

毛泽东在获知林彪乘飞机外逃苏联时，还不全信，他叫总理（周恩来）再了解进一步情况。等到林彪乘飞机外逃已四个多小时，警卫部队找不到林彪后，总理作第三次报告时，毛泽东还半信半疑，对在场的政治局委员说：“他（林彪）会害怕我不能容留他，要走人。”毛仰望著天花板长叹一口气，说：“高，高超！我被他骗了，骗了二十二年。你们都被骗了！不要做事后诸葛亮！”毛泽东还指著周恩来、江青责骂道：“一个总理，一个我老婆，都把副主席抬得天一样高，我也受你们的骗了。”

姚文元写道：林彪事件后，毛泽东一度精神恍惚，摔东西，骂人，驱赶身边的工作人员。

有时，唯有周恩来安排李敏、李讷由张玉凤陪著，去安慰父亲（毛泽东），才能使毛泽东的情绪平静些。

#### ◇ 毛泽东对周恩来追悼会的意见

姚文元写道：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要开追悼会。毛泽东批示，由政治局拟一个意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等表态，请毛泽东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我（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江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的意见上，圈了华国锋、陈锡联等人表态的意见，批上“好”字。在决定谁主持追悼会时，又争持不下，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

#### ◇ 毛泽东对“四五”天安门事件的反应

七六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姚文元证实，对七六年清明天安门事件的定性、镇压，都是由毛泽东决定的。

#### ◇ 关于对邓小平的处理决定

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

毛泽东在政治局讨论纪要上，圈了叶剑英，批上：是在指责我。圈了李先念，批上：还是给我面子。圈了华、陈、吴、纪，批上：意见相同，我还活着，留在党内。

#### ◇ 关于总理人选

姚文元写道：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总理人选时，提出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还提出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是汪东兴提名，报送主席的。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第一副主席”，圈掉李、张、江青，同时打“□”。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也得等我死后。”

#### ◇ 关于对黄、吴、邱、李的处理

姚文元还爆出史实内幕：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央政治局曾讨论如何处理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四人及其他随从的问题，都无主意，请示主席。毛泽东说：走资派、叛徒、内奸、工贼、现行反革命，都能处理、解决，对军事政变集团、投向北面敌人的一伙，还处理、解决不了？军事法庭被砸了，为什么不送军事法庭审判？毛又指示：判黄、吴、邱、李死刑，也不过份。毛泽东还问了多名老师，老师对林彪无好感，但也不赞同判他们死刑。后来，四十多名将军的意见也基本一致，认为这四个人“罪不致死”，要求“养起来”，甚至还有



的将军提出：指控他们政变、谋害，都缺乏证据，要求调查、核实。

#### ◇ 毛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子虚乌有

姚文元还爆出：“九一一三”林彪事件，在中央公布的资料中，掺了很多假，有的是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需要而编汇的。因为当时有过决议：一切要从维护毛主席形象、绝对权威，维护毛泽东思想、维护文化大革命、维护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几大原则出发。

姚文元爆出：关于毛泽东给华国锋写的“你办事，我放心”，事实上并不存在，是虚构出来的。

#### ◇ 毛为身后事忧虑

姚文元爆出：毛自从林彪事件后至临终，常忧虑他死后老帅们会造反，出现中国军中的赫鲁晓夫，怎么办？

姚文元又写道：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

### 【研究报告】

#### 毛的晚年悖论及其遗产

• 陈奎德 •

#### ◇ 大陆“十七年体制”

对于大陆文革前的十七年，人们由于身处的地位和不同视角，容或会勾勒出不尽相同的图景。但是，如下几点恐怕是大体的共识。即，从1949年起，特别是1957年以后，中国大陆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基本类似于列宁所创斯大林所确立的苏式体制〔1〕。传统的民间社会已不复存在。中国共产党通过单位制、公社制、户口制和档案制的巨大网络，透过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空前严密地掌控了社会。

这个庞大的网络体制的关键枢纽，就是各地区各单位的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由于全国实质上是处于一个（国有）雇主之下的“大工厂”，没有选择雇主的可能，因此，“不服从者不得食”。在各“枢纽”人物管辖下的大部分人，“无所逃遁于天地之间”。鉴于此，各单位上下之间的权力关系，带有某种绝对的性质，蕴含有某种基本的内在紧张。

这里所谓“十七年体制”，不应忘记，是以毛泽东为象征符号和旗帜的。

文革前夕一、二年，上述内在紧张更加强化。以“深入贯彻阶级路线”为标志、“家庭出身歧视”的泛化到全社会，社会等级的划分业已开始出现公开化和制度化的征兆。

文革的早期，即所谓“老红卫兵”或“联动”时期，也即“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时期，不过是把上述前十七年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方式赤裸裸地推到了登峰造极之点而已，是十七年体制顺理成章的发展和极化。

但是，以1966年10月《红旗》杂志发表第十三期社论为标志，所谓“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轰然而起。在毛泽东的意旨下，文革出现了新的方向———实质上是质疑和挑战前十七年体制的方向。这是文革与中共过去历次运动的最大不同点。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新方向？这是至今仍然聚讼纷纭的疑点。

#### ◇ “反权威的悖论”

确实，就文革而论，毛的面孔并不是单一的。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毛呈现出不同的面孔，它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通观文革全过程中毛的言行（2），有理由认为，毛的意图的确具有某种复杂性。事实上，旁观者对毛的感受也呈现了复杂性。

王绍光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认为（3），权力斗争不足以解释毛的动机，他认为毛打垮刘少奇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笔者并不以为毛能很轻易搞掉刘，毕竟，毛的公开的崇高地位同党内高层的知情程度及其运作机制是并不能完全划等号的。

但是我仍同意，毛的动机绝不仅仅是清除几个政治对手而已。从毛的言行看，无论是对自己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对自己的智力和德行，毛的自我期许是极高极高的。

毛在晚年曾批评中共大官僚们：“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大官们压人，但是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們要革命。”类似的话，毛还讲过多次。

联系到毛的文革举措，它的容易预期的翻天覆地的社会振荡后果，可以合理地假定，发动文革的动机，除了权力斗争的逻辑对毛的要求外，毛还欲给自己增加道义上的分量。就是说，在翦除其政治对手这一现实的目标之外，他还欲赋予自己以崇高的道义形象。毛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更高的不可能实现的野心：既要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最高统治者，同时又要作为受该体系压制的下层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身而兼二任，既是民粹主义者又是极权主义者。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角色。而毛确实是以这种“首创者”的角色自命的。毛的这种近乎疯狂的自我期许，如果不联系到他的巨大辉煌的事功，是不可能理解的。毛以一个农家子而横扫天下，取得神器，其前半生的惊人成功使其飘飘然，无限地膨胀了他的自我估价。他所谓“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正是其“无所不能”心理的写照。而成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人”的幻觉目标在这种心态下是顺理成章的。我以为，这是理解毛在文革中一系列矛盾怪诞行为的钥匙。

如此，诞生了一种怪异的文革式“反权威”逻辑：

以一个最高的权威为凭借并在其支持与庇护下的反（次等）权威的运动。然而这一最高权威并非上帝，他有自身的利益和七情六欲，无法抗拒插手人间事务并裁决是非的诱惑。因此，难免随势迁移，变幻无常。鉴于此，文革式“反权威”者们的命运并非自身所能决定，而是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即“政治牺牲品”的宿命角色。而就毛氏“反权威”而言，它内含先天的逻辑悖论：即，一个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起而号召反对该体制。由于其中所固有的非自然性和矫伪性，注定使其不可能真正贯彻到底。

让我们极其简单地扫描一下毛在文革中起伏不定的基本行止。

从一开始起，在他鼓动学生“炮打司令部”“反对资反路线”，明显地要全面摧毁原十七年

的官僚体制的同时，他又预留一手，把军队排除在运动之外，亲自制止“反军乱军，毁我长城”的造反，精心地欲维持原十七年体制的最主要支柱——军队；

从他在六六年怒斥刘邓工作组“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白色恐怖，慷慨激昂地声称“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到后来的六八年八月，他自己又把工宣队、军宣队派驻进校，使群众运动嘎然而止，并于之后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使类似六六年“五十多天资反路线”的恐怖时代重新降临。（事实上，六八年八月之后，毛已在致力于恢复体制，而这期间被纳入新体制的极少数作点缀的“造反派”，如王洪文等，已完全成为新的既得利益者的“官”，成为新体制的主流（左派）。因此，这之后中共上层左翼和右翼之争，与反资反路线时造反派与当权派的斗争的性质已完全不同）；

从他极为借重并与各地造反派红卫兵和中央文革笔杆子王关戚等联手反官僚，到后来，又把王关戚们打入冷宫并把“小将们”放逐农村；

从他怒斥陈毅谭震林等老军头们为维护原体制而发起的“二月逆流”，到后来不得不亲赴陈毅的灵堂吊唁哭丧，把“二月逆流”的老将们再次扶上高位；

从他把林彪抬到吓人的高度并写进宪法，到后来为安抚老军头和高干而戏剧性地搞垮林彪；

从他打倒原体制的重镇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又重新起用邓小平；然而，到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又再次批邓并罢黜邓小平。

.....

所有毛的这些来来回回，反反复复，都源于那种“体制的主要缔造者和象征符号号召反对该体制”所固有的非自然性、矫伪性和不彻底性。

上述根本矛盾也就是毛被他自身点起的一把火弄得左右支拙，在文革中起起伏伏，艰难地玩弄平衡的内在原因。

其实，毛那个自命不凡的头脑恐怕一直就没有想清楚的是，他批判大官们享有的“比资本家还厉害”的特权，反求诸己，他自己的特权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毛自己正是“最大的官”。没有迹象表明他对此曾有过哪怕是丝毫的自我反省，更别说自行放弃这些特权了。而且，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没有那些“官”们，他本人如何可能当上“最大的官”？没有这个体制，他什么都不是，不过湖南一教员而已。全部问题在于，他既要保有体制所赋予自己的最大利益，又要享有体制的受压者的衷心拥戴。这是在做一道注定无解的习题，从较长的观点看，“熊掌与鱼，二者不可得兼也”。

就思想内涵而言，毛的那一套简陋的乌托邦，其想象力从未超出“延安精神”、“桃花源”、“井田制”、“五斗米教”乃至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孔子“大同书”的范围，而且漫无系统。但是由于他享有的巨大权力，这一粗糙的理想居然影响了几亿人长达十年的生活，并造成无数生命财产的毁灭和社会价值系统的崩溃。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诚然，毛不是没有自己的创造的。他的创造在于，文革的运作方式在一段时期内使他与列宁创造的党控制社会的运作方式有了重大区别。列宁式主要依赖组织的网络逐层逐层地下达并控制各级社会，毛则是没有中间环节从最高层通过广播报纸文件直接下达基层，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即是说，列宁主要靠组织，毛文革主要靠宣传。列宁方式有很大的强制性，毛方式则

有很大的煽动性，并且，在一段短暂时期内，赋予了下层民众以解放感。

但是，文革后期（1968年夏天之后），毛向列宁方式的复归，表明他的新方式无法长期操纵控制社会，无法建立起一个持久的新秩序。离开过去长期培植起来的得心应手的党组织网络，他无法稳定新体制和新秩序。最后，不得不向他过去建立的旧秩序投降。

他的被看做是临终遗言的话谈到其一生中所做的两件事：一是打赢内战建立中共政权，二是发动文革。前者是确立体制，后者某种意义上正是搞垮该体制。他认为前者受到（党内）拥护，后者则（党内）拥护者甚少。这表明，他耿耿于怀一直萦绕和困惑其晚年心灵的，正是这两项相互矛盾的遗产。他无法二者兼顾。文革期间，毛一直在他的这两项遗产中摇摆、平衡，一直到他的去世前，上述难解的心结仍在折磨和困扰他。

毛的一系列操作平衡权术的过程，虽然使他能永远保持最高的地位，而免于被任何一个政治派系所挟持，所取代，但也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实质上，这一过程消耗掉了他过去积累起来的庞大的政治资源，磨损并消费掉了左右两翼的忠诚情结，黯淡了他曾经拥有的理想主义神圣光圈，揭开了他及中共所建立的道德价值系统的虚伪性，损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信誉，促成了整个社会的政治幻灭。上述那些派别由于反反复复的被利用然后又被抛弃，由于毛玩弄权术过于明显，长此以往，甚至引起了双方的共同怨恨。

另外，任何“反权威”的思潮（毛启动的也不例外），本有其自身的寻求其终点的内在动力。一旦把“反体制”的造反狂潮放开闸门，尽管施加了诸多限制甚至残酷的镇压，但潮流仍将流向自己的逻辑终点：最终走向反“最高权威”。

事实上，四五天安门事件就是其逻辑后果。这正是始作俑者毛的初衷的反面。

从上述几方面看，他的“一身而兼二任”的狂想尝试都悲惨地失败了。

#### ◇ 文革“遗产”：“逍遥派”及其他

文革，对于中共统治集团而言，犹如一列大体沿着斯大林式轨道行驶的列车突然被抛出了轨，产生了存亡继绝的重大危机。这就迫使它重新调整，寻找方向。在此痛苦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过去（十七年体制）的谬误，同时，也发现了若用极端的毁坏秩序的方式将导致的更大灾难。于是，被迫接受唯一可行的改革方向：开启门户，准备进入过去曾诅咒的世界主流秩序。这恐怕是文革带给中共的基本“遗产”。

然而，作为负面遗产，文革的经历，也给中共统治集团遗留了烙印很深的“文革情结”，即对自发的民众运动的极端敏感、恐惧和仇视。这也就埋下了日后不可能用妥协的方式处理类似情势的种子。邓小平称1989年的学生运动为文革造反的再现，就是其“文革情结”悲剧性的展现。

就文革对整个社会的具体“遗产”而论，已经不少人作了分析，如，解除了中共各级领导人“神圣不可侵犯”的魔咒；由于因果报应的普遍性所引起的文革式“政治迫害”的无人豁免，导致废除其基础——阶级斗争为国策的理论；并进而导致淡化身分等级制、平反“贱民”——五类分子；“文件政治”式的“中央人治”取代了文革前的“层层人治”；“法治”和“人权”观念在民间萌生；官方意识形态在青年中破产；一代人的启蒙〔4〕；……等等。笔者认为上述分析大体上仍是有效的，兹不赘述。

本文只概略补充较少被人注意的两点，一是文革作为“政治实验室”的功能，二是文革“逍遥派”在文革期间尤其在文革后的角色分析。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文革，是作为一次“微型的”“拟真的”政治过程的预演。其中的政治参与者，鉴于“奉旨造反”的基本格局，由于国门关闭，新闻封锁，长期接受单一的意识形态灌输和愚民教育，缺乏真实历史的知识，不懂得基本的政治运作常识，因此，开初的政治操作极其幼稚，基本上是毛意图的揣摩者跟随者和宣传机器的应声虫。

但是，据笔者的仔细观察，在文革中，由于基本生存本能的驱使，由于对十七年来自身社会地位和利益的准确直觉，在实际的各组织和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角逐中，在极其险恶的情势下，人们对政治领悟极快，进展神速。无论是在组织、宣传，还是在情报、外交等方面，把一种“模拟政治”变成了“政治实验室”，马基雅维里式的诸种政治技巧在其中自发地出现。他们通过“阳奉阴违”，对毛指示的“各取所需”和“各自解释”，开始有了一些政治自主性，“木偶政治”逐步变成了“真实政治”。很多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治谋略，开始出现在派别斗争中，逐渐玩起了复杂的政治游戏。

短短几年的政治成长历程，某种意义上浓缩了千年政治智慧的发展。文革在这个意义上培养了中国的一代政客 (politician)，和大量的政治观察家和评论家。这样的一批人已经或正在进入中国的各级权力阶梯，他们的文革经验对其政治行为和理念显然有不可低估的影响，清醒地意识到这一参数，对分析中国的未来路向也许是不无助益的。

另外，人们注意到一桩现象，文革之后，即所谓“新历史时期”中，活跃于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在文革中是所谓“逍遥派”。这是不是一桩偶然现象呢？讨论这一问题，必须追溯到文革后期的社会状况和普遍心态。

文革后期，经过了一场政治大幻灭，中国社会变成了一个梦想和精力都被“掏空了的社会”、“虚无主义”、“犬儒主义”出现并蔓延，所谓“看透了世事”的心态空前泛滥。这对那些文革的积极参与者，尤其如此。

另外，少数文革中红极一时的造反派头目以及后期进入领导机构的既得利益者，随着运动中被整的老干部的复出，被划归为所谓“三种人”而受到了清算。

这意味着，无论是主观意愿还是客观环境，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将暂时离开历史舞台了。然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另一批人将出现在所腾出来的空间。

我这里主要所指的是在民间，即所谓文革的旁观者——“逍遥派”。

所谓“逍遥派”，主要指文革期间，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未参加或很早就退出群众组织，置身于运动之外的人。

比较文革中的“逍遥派”与“造反派”个性素质，可以看出，大体上，前者偏重于思想，后者偏重于行动；前者接近于理智型，后者接近于情感型；前者倾向于怀疑，后者倾向于信仰。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他们所起作用的大小是不同的。

在文革之后，“逍遥派”比较超然，相对客观，其政治资源、精力和能量也没有被耗尽。相对于其政治名誉、政治资源、精力、能量和理想都已被耗尽的文革风云人物，“逍遥派”反而保留了某种程度的理想主义，反而因长期“冬眠”而积蓄了某种隐忍待发的精神能量，反而获得

了较多的思想、文化和政治活动空间。同时，加上在文革中冷眼旁观，具有某种观察距离，获得了对文革的较少个人感情色彩的理性思考，也通过反思获得了一些政治智慧。鉴于此，在原“逍遥派”中出现了一批新的带独立色彩的精神承载者。在文革后的思想和文化活动中，由于上述原因，这批人迅速崛起，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力量。笔者曾作过一个统计，在八十年代知识界的活跃人物中，原“逍遥派”占了一个相当的比例。譬如，作为前文革“逍遥派”，后来对八十年代的青年曾经发生过一定影响的李泽厚，严家其、刘在复、方励之、许良英和金观涛……等人即是典型例子。

诚然，由于八十年代观念市场变迁迅速，从而观念的消费加速，八十年代知识界活跃人物同样存在思想储备被迅速掏空的可能性，他们能否免于这种命运，则看其精神的再生产能力了。

注：

(1) RUSSIA UNDER THE BOLSHEVIK REGIME, by Richard Pipes, New York, 1993

(2) 《毛泽东思想万岁》，北京，1967年3月。另：文中所引毛本人的讲话、文章和诗词，皆见于中国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大量重复，人所共知，兹不赘注

(3) 《二十一世纪》总第31期

(4) 参看《华夏文摘增刊》第84期

本文是哈佛费正清中心与二十一世纪基金会联合主办文革研讨会论文

□ 原载《观察》网站

~~~~~

## 【追根溯源】

### 文革学研究——文革与诸子百家

• 胡星斗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叶剑英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现在看来，死亡人数也许没有这么多，但无数的人遭受迫害、屠戮，是不争的事实。刘少奇、彭德怀、陶铸、贺龙等国家领导人被迫害致死；赵健民特务案连累致死14000多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冀东冤案迫害8万4千多人，致死2955人；一些地方的武斗共死几十万人；1967年8月28日，当局开枪打死了101名游行学生；北京大兴县乱杀“四类分子”，一次杀了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等地的大屠杀更是惨绝人寰，当地农村纷纷成立“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宣判死刑，被害者有数万人（仅道县就上万人），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铤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刮、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等，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真是丧尽天良！

“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反修防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其诱发的源头可追溯到50年代的“波匈事件”、苏共20大、庐山会议，以及后来的三年困难、七千人大会、“四清运动”等。不过，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与诸子百家等历史传统也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

“文化大革命”与儒家：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

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一方面批儒，另一方面本身又受到儒家思想极大的影响，如其自觉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灭资、大公无私、好领导、好干部以及运动式人治等思想皆与儒家的自觉修身、反省、克己、灭私欲、圣贤、明君、清官、排斥法治等理论如出一辙。两者都属于传统的治国理论，是建立在人性本善、道德万能、相信官员能自觉克制私欲、自觉为官清廉、自觉为民做主的假设基础上的。而现代治国理论则是，人性是恶的，任何人都容易腐化堕落，所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法律监督权力，以民主约束权力。

“文化大革命”与道家：毛泽东说，《老子》是一部兵书。可见，他深谙道家哲学。确实，毛泽东之韬光养晦、无为而治（暗中操纵“四人帮”，任由全国乱局发展）、借力打力、谋略为先、辩正施治等都留有道家的深刻烙印。然而，毛也有违反道家的方面，其“运动”、“大乱”思想正与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的贵静思想相悖。

“文化大革命”与法家：毛泽东是极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发动了“尊法批儒”的运动，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传统中国的政治架构即是商鞅、秦始皇的郡县制，它形成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上级命令和任命下级、全国只有唯一的权力中心（即“中央”、“皇帝”）、行政权力无所不能的官僚人治体制，与现代政治制度的网络式分权，政务官由民主选举产生，省长、市长、县长只对其选区内的选民负责、不对上司负责，实行联邦制、地方自治，具有“有限政府”（行政权力受到约束）、多个权力中心（各级行政中心、立法中心、司法中心，一般没有“中央”称谓，只有“联邦政府”称谓）的法治分权体制有着根本的区别。

“文化大革命”与墨家：毛泽东的思想主要是墨家思想。墨子及后期墨家的小农反剥削、反享受、反读书、反知识、乌托邦、助人、分财、殉道精神（为领袖献身）以及集体主义、专制主义、平均主义、平民主义（向贫下中农学习，上山下乡）、经验主义（片面强调实践）等与毛泽东的主张何其相似！所以，我们认为，毛泽东实际上是墨家思想的实践者，他以墨反儒，其实没有逃出传统。

“文化大革命”与兵家：兵家主张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声东击西、不战而胜、出奇制胜、择人任势、危机管理（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等，毛泽东不愧为大军事家，深得个中三昧。如“文革”中利用群众运动造势；毛泽东将国家投于“亡地”，背水一战；刘少奇征得毛的同意派出工作组，然后毛突然回到北京批刘：“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可见，兵家谋略是毛泽东最为得心应手的。

“文化大革命”与名家：名家主张“名”、“实”之辩，争论名实关系，有某种逻辑的思想，同时贯穿了中国式的无聊狡辩与文字游戏，他们争论着白马非马、鸡有三足、鸡蛋有毛等问题。“文革”中，“反修防修”不就是要争社会主义的正统之名、并且要实行地道的（与原教旨分毫不差的）社会主义吗？那时，无聊的争辩、各种文字诛伐不也盛行于大江南北吗？

“文化大革命”与农家：以许行、陈相为代表的农家重视发展小农经济、农业生产，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参加劳动，反对商业，反对剥削，反对奢侈享受，反对贵族文化。农家具有类似于现代民粹主义的思想。毛泽东也是民粹主义者，他的平民至上的倾向既有先进性，又有落后性——按照农家的观点，抽象理论、文学艺术、商业繁荣都没有必要存在了。

“文化大革命”与纵横家：纵横家主张纵横捭阖、竞争用权、揣摩人心、设套钓言、阴谋诡计、巧言游说等，这一套在文革中不是十分盛行吗？毛泽东就是纵横捭阖、竞争用权之高手，“反右”中“引蛇出洞”之“阳谋”、“文革”中之“大鸣大放”都使无数的人罹难其中。

从上可见，“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完全“革文化的命”，而是对诸子百家以及各种文化传统（特别是劣质的东西）有着继承、“发扬光大”，同时，它“以传统反传统”，终究落入了传统文化的窠臼。今天，我们研究文革学，正需要反思千年传统，反省民族精神，以现代人类文明、现代中华文明重铸民族之魂，防止“准文革”、“类文革”的发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